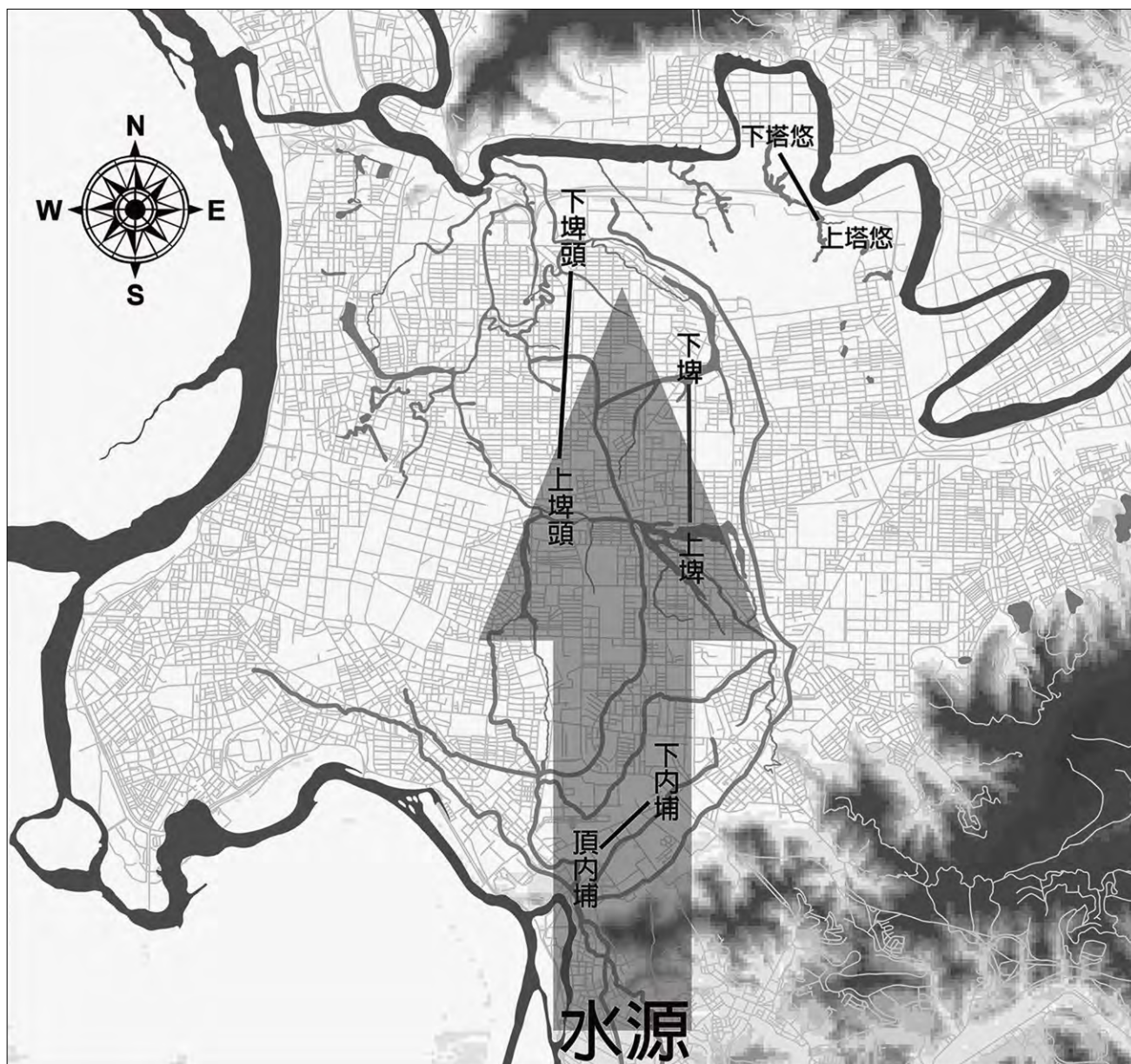


百年來的臺北城市空間認知轉變

Changing of the Spatial Cognition in Taipei Basin for the Past 100 Years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Hung, Chih-we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清代臺北盆地內與水圳流向有關之地名的示意圖。本圖以臺灣堡圖內之地名，呈現臺北盆地內與水圳流向有關之地名，例如：下塔悠位於上塔悠下游，下埤與下埤頭在上埤與上埤頭下游，下內埔位於頂內埔下游。（本圖之極淺灰色底圖為如今臺北市之街道，供古今位置比對之用。另以1904年臺灣堡圖，描繪出埤圳的分佈）

如今走在臺北街頭，應該有不少人會發現，臺北市區的道路有個有趣的現象，除了有著中國各地城市之名外，區分出的XX西路與XX東路，怎麼會造成「大東區小西區」的不平衡呢？XX西路總是很短，但XX東路卻可以很長，還分成好幾段。這樣的規劃，到底是怎麼產生的？而臺北的發展上，大家是否真的一開始就有「東西南北」或「北方在上」的概念呢？

農業開發時代的水圳空間觀

大臺北地區的開發若以1709年的〈大加臘墾荒告示〉來看的話，迄今已超過三百年。臺北地區農地開墾過程中的水田化，與乾隆年間整個水利設施的開發有關。臺北的主要農田水利設施，有取水自景尾溪（今景美溪）灌溉臺北西部的霧裡薛圳，取水自新店溪灌溉臺北東部的瑠公圳，以及盆地內的大小埤塘（主要的有上埤、下埤與雙連埤）。這些埤圳的開發，提供了農田穩定的水源，使得臺北的水田化運動達到極盛期。

埤與圳這兩種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的差異，在於水圳往往於上游地勢高處的溪流引水，而埤塘主要靠儲存雨水獲得水源。但臺北的埤圳系統，除了水利秩序緊張的瑠公圳外，霧裡薛圳和各主要埤塘間，卻有「埤圳相連、埤埤相接」的空間特色。例如霧裡薛圳末端與埤子腳埤相接，又與上埤相連，而後接大竹圍埤和雙連埤；而較東側的下埤，亦與霧裡薛圳另一幹線相接；甚至1904年臺灣堡圖內已不清楚的三板橋埤，亦是與雙連埤相通。

這些埤塘的相連，以及水圳水尾和埤塘的相接，都讓埤塘的水源除了雨水外，也能接收水圳水尾的餘水。是故這些埤圳相連而成的水路空間，即成為當時人們形成空間認知時最重要的參考依據。

若我們以臺灣堡圖來細看清代整個平原地區的地名，除了這些埤圳相關地名可以指射相對應的埤圳系統外，尚有不少與方位有關的地名，以「上」、「下」、「頂」等字呈現了當時人們的空間認知。以這類地名來看，有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亦是習慣以北在上南在下觀點做空間認知者會難以理解的是：（1）下塔悠位於北、上塔悠位於南。（2）下埤頭在北、上埤頭在南。（3）下內埔位於較北、頂內埔位於較南。很明顯地，這些農田區域的臺北平原地名，有著「下」在北，而「上」或「頂」在南的特色。

這樣的地名特色，顯示出在這個臺北盆地內仍以農耕為主的時代，對於在平原內生活的人們而言，習以為常的方向認知，是以水圳由「上」之源頭往「下」流動的方向。在當時，臺北平原內兩大水圳均是由較南的景尾溪（今景美溪）與新店溪取水，繼而往北流，所以農業臺北的時代，民眾很自然會以水圳的水流來源視為「上」或「頂」，而對比之的水圳尾端便成「下」。因此，這些清末以迄日本時代初期的臺北地名，會有上在南，下在北的情形。而以水圳的流向而成為地名命名特徵的「下內埔」與「頂內埔」，也有「下內埔」位於「頂內埔」的東北側，此軸線正好與瑠公圳過公館蟾蜍山後的東北／西南走向一致。是故，整個臺北平原地區在清代的人們空間認知中，大加蚋堡的地名系統，整體上是以北在下南在上的水圳水流走向來稱之。

河港型市街型態的空間觀

然而，臺北的發展，在艋舺、大稻埕這兩個重要的河港型市街興起之後，又有另一層的空間認知產生。所謂的河港型市街是指主要的街道平行於河道的走向，而在與其垂直的向度上則呈不規則或深或淺的發展，臺灣很多的河港聚落均有此特色，而臺北的艋舺與大稻埕亦為其中的代表。

在這樣的市街空間格局中，人們的空間認知很明顯便會以河道的走向為橫軸來思考。若又以從河面上陸的印象來做空間的認知，便會把河岸第一排的街區置於前，越往內陸發展而深淺不一的部分置於後，以臺北的艋舺及大稻埕與淡水河間的位置關係來看，便會呈現西前東後南右北左的空間認知。此空間認知與如今人們習以為常的北方在上不同，也與以水圳上游為上的觀點有所不同。

這個由河面往內陸盆地所望而形成的空間認知，可見於一些街道的名稱裏。例如較早形成的南北向舊街（約略為今日之西昌街），在其東側有一同為南北向與土治前街相接的新街。此一新街的名稱被叫為「頂新街」，其字意除了表示為新的街道外，還有呈現方向性空間認知為在上的「頂」。若我們以如今習慣的北方在上思考，便難以解釋為何居於舊街以東的新街要稱為「頂新街」。然若把空間認知的座標改為「西前東後」的「河道在前，盆地內陸在後」視角，則可意會當時代人所謂的「頂」字意涵，也才能理解



艋舺與大稻埕是典型的河港型市街，因商業機能從河岸而起，市街逐漸往內陸盆地發展，故發展出從河往內陸觀看的空間認知，因而留下許多「西前東後」的地名與街路名。

「頂新街」之稱法的空間認知意義。

除了艋舺以外，大稻埕的街道名稱有著更為清楚與明顯的與河道方位相關。例如位於淡水河岸的港邊街（南北走向），在其東側的港邊後街，其所謂的「後」，已經顯現出前後方位是以「西前東後」的方位觀為準。同樣的狀況，還有建昌街與建昌後街。至於與太平街呈現垂直的太平橫街，其「橫」的意味，如果以南北方向觀來看，應該是「直」才對。既然把南北向的街道稱為「橫街」，即可顯現出其方向觀點其實是將南北向視為「橫向」，東西向視為「直向」，且從河道的「前」，對應往東的「後」。這樣的街道名稱，顯現出的正是河港型市街的聚落發展，不只呈現在建物的從河岸往內陸拓展，也影響了當時代人對於空間認知中的方向感。

三市街時代的臺北城內空間觀

對於臺北城的興建，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城牆的方位、城內主要官制建築的座向，以及街道的方位



劉銘傳接手臺北城內官署的興建後，引進中國傳統坐北朝南空間認知。

有相當多的研究，大多數的論述也從城牆興建前後的差異，為何方形的城牆與城內道路的交角，與風水祖山的觀念加以論述。然而，若我們將臺北城牆興建前後做為一個時間上的分期，探討城內官制建築的空間座向，則可以發現三種不同的方向體系，代表的也正是三種不同的空間認知。

臺北城牆的興建，大約於1884年11月完工。值此劉銘傳接手整個臺灣及臺北建設的時代，在城內也開始了大量官署建築的興建，特別是臺灣建省後，臺北城內各級政府機關紛紛興建，制度上原本分屬各級政府的一些書院、學堂、官廟等較次要設施，便可共用節省開支。而直到1891年劉銘傳去職前，在其主導下興建的主要城內官署建築有巡撫衙門（1889年建，坐北朝南）、布政使司衙門（1889年建，坐北朝南）、天后宮（1888年建、坐北朝南）。值得注意的是，其方位座向雖然不管劉璈時代將城牆轉向對正七星山的方位，卻也和陳星聚、岑毓英時代坐東向西的方向不同，而是利用了東西南北棋盤狀的

街道格局，以坐北朝南建構城內主要官署的座向。

如今，我們若重新整理這短短大約十年間臺北城與城內官署空間向位的改變，即可看出三種不同的空間認知與思維。最早的陳星聚時期，其臺北府署的座向與城內街道方位，甚至考棚的方向，均延續了河港型市街型態的空間認知，即是以淡水河的南北向平

行往東，由西向東的空間認知以東方為上位，稱東側為「後」或「頂」。故臺北府署與考棚為坐東向西，座落於上位。但此格局被需要「祖山可憑」，得找「靠山」的劉璈接手後，改不了城內的街道與已建府署，但仍堅持修改城牆方位正對七星山。這個風水方向認知上的修改，其實在清代的臺北三市街中影響不大，因為城內街道並未跟著轉變。不過這個影響，反而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拆除城牆並闢為三線道，接著又以此方向往北及往東所延伸的1905年臺北市區計畫，讓此向位的影響發揮到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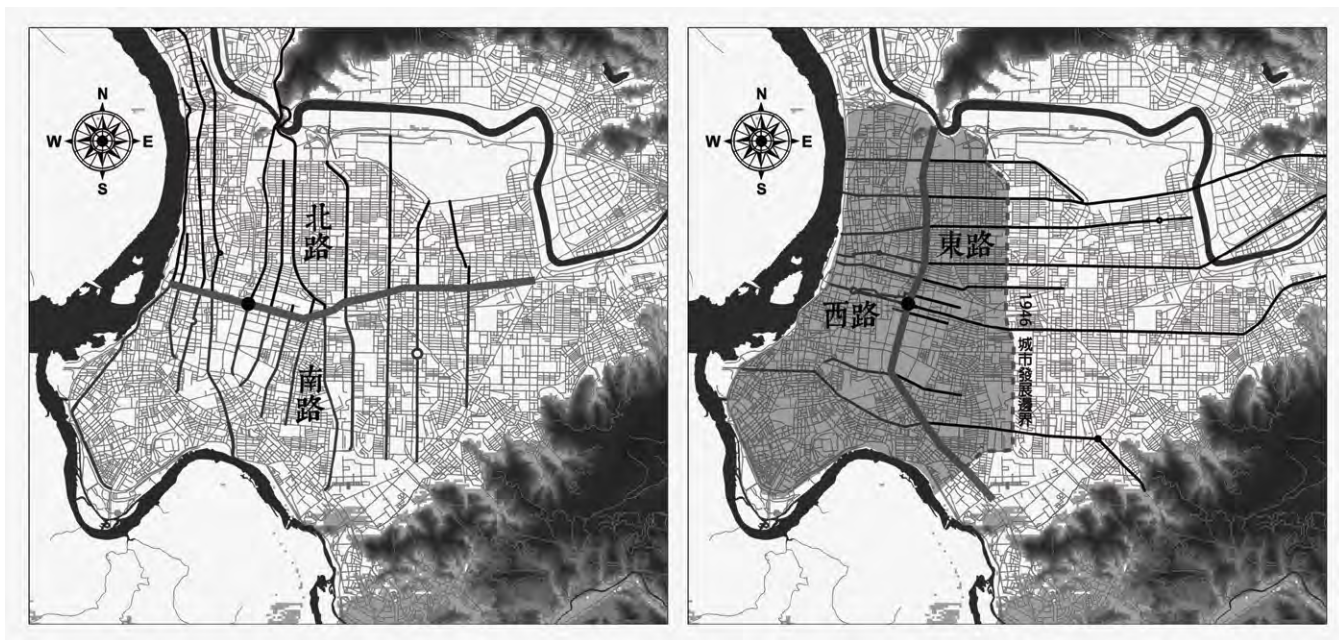
然而，對照於劉璈找靠山的方位觀，有「新潮思想」的劉銘傳所展現的是否就有先進思維？以其到任後所興建的官署建築方位來看則是未必。劉銘傳所興建的主要建築，幾乎都以坐北朝南的中國傳統統治者視角為其空間認知。這樣的官署建築設計，剛好因為陳星聚起造的府署時代規畫，是坐東朝西，又有南北向的棋盤狀街道配合，故在轉為坐北朝南的以北為上位的中國傳統空間認知時，並不會

有轉向上的困難。不過劉銘傳的建設多以臺北為中心，奠定臺北為臺灣首善之都地位的眼光，卻在城內的官署格局中帶來了「從臺北看天下」的統治視角。

大都會時代的臺北空間觀

臺灣在進入了日本統治時代後，臺北盆地內的區域，在1920年10月臺北市設立前，是屬臺北廳所直轄的階段，庄名的使用上大多沿續了清代的稱法。至於屬錫口支廳的錫口區，意即後來臺北市的東區中，也多延續了清領時期的地名用法。因此，以整個當時臺北盆地的範圍內來看，除了三市街的部分，大多數的區域內，其庄名所代表的空間認知，仍

以水圳的上游為「頂」或「上」。然而，臺灣總督府於1899年公告了臺北市區計畫，正式為都市空間引進了科學治理的態度，且正規的測量地圖（圖繪式的鳥瞰圖或工商服務用的市街圖除外），皆以正北向上的空間認知來呈現，製圖的認知系統不再是以繪圖者的「身體」為主體向外觀看模擬而得。而三市街的庶民由西向東望的空間認知，以東為上位之空間認知觀點，雖然仍見於日本統治初期的地圖中，但隨著艋舺及大稻埕舊街區的市區計畫街路修改，以及隨後新街區規劃時，在正對七星山的城牆拆除改為三線道，又依此方位沿伸後，日本統治臺灣前期的街道向位反而意外地以正對七星山的角度為最大宗。不過，街道方位雖為如此，但當時以農業區為主



本圖中之灰色陰影區域為1946年時臺北的城市發展範圍，黑色圓點為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位置，亦為東西南北街路分界之中心點。左圖標出現今臺北市道路名中，XX南/北路之分界，係以忠孝西路、忠孝東路一段與八德路為中軸切分線（XX北路以黑線表示，XX南路以灰線表示）。右圖則畫出臺北的XX東/西路之分佈，是以中山南北路與羅斯福路做為切分（XX東路以黑線表示，XX西路以灰線表示）。



臺北城牆方向受風水觀影響，正對盆地周邊最高峰七星山之方向。

的大部分區域，仍以水圳為空間認知的準則，大部分呈現「下」在北，而「頂」或「上」在南的情形，展現臺北主要水圳系統是以新店溪或景美溪地勢較高處取水而後下流的情形。

在1922年4月臺北市實行「町名改正」之際，各式町名不少是以日式名稱稱之，而繼承自原有庄名的仍有在南的上埤頭與在北的下埤頭，但原本頂內埔和下內埔的對比，因頂內埔改為富田町，僅留「下內埔」之名。而此次町名改正最特別之處，是以平埔族地名，特別是清代因大多數用地被用來做為臺北城

而範圍縮減的的奎府聚庄，重新出現了「上奎府町」與「下奎府町」這個本土地名，且下在北，上在南！

隨著1930年代整個臺北大都會的往東拓展大計畫，引進西方大都會筆直大道的都會藍圖願景，以水圳上游為上位的朝南觀，勢必要被以北向上，而以整體區域發展的都市計畫觀所取代。

臺北在1930年代所提出的大都會擴展計畫，表面上雖以北為上的近代空間治理為製圖準則，但在規劃時以方格狀東西南北的筆直大道，重新劃開了清

代農耕社會中遺留下的水圳埤塘土地痕跡。在這個新穎的大都會藍圖中，都市計畫的觀點著眼於區域的均衡發展，以及以整體空間來看的布局。

不過，在日本統治臺灣，把清代的「街名系統」改為「町目系統」後，「XX町X丁目」這樣以一塊一塊街區來劃分城市區塊的方式，讓街道名稱在當時的臺灣城市內，成為一種不需要的額外累贅。但是，在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要廢除日本式的町目系統引進街路系統時，便有了替街道取名的問題發生。

二戰後臺北市的中國地名街道

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破除日本統治觀念，乃頒布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廢除町目的區劃，改為街路名，並且消滅與日本有關之稱法，例如大正町、昭和町、乃木町、兒玉町這類的地名，改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如中華路、信義路……）、宣揚三民主義（如民生路、民族路、民權路……）、紀念國家偉大人物（如中山路、中正路……），或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當時的臺北市情形特殊，在一位來自上海的鄭定邦於1946年中代理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技正後，帶來上海以中國地名來規劃的想法，很直接地中山南北路為東西區劃軸線，又以忠孝東西路（當時稱中正東西路）為南北分界線，將臺北市劃成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個區域，再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依此地理空間區劃訂為路名。因此，經由鄭定邦之手，中國地名式的新路名，配合大陸的地理空間，在當時的臺北市區內誕生。

這次的街道取名，以全新的中國地理空間地名，配合四個相位的市區空間劃設。將一個中國「內地」地理空間版圖，強加在臺北市區內，儘管可以說是移植自上海的「先例」或「傳統」，但帶進臺北地區的空間觀已經難以和在地有所連結，唯一的空間概念就是期待所有市民必須時時心中有中國，理解中國的地理地名，了解此版圖，才能套到臺北市內的空間中。

而在1947年這次鄭定邦主導的新路名計畫中，還引進了X X東路（街）、X X西路（街）、X X南路（街）與X X北路（街）這樣的東西南北路名切分方式，所



如今行政院前仍有許多臺灣重要道路的0公里起點標誌。



上海的南京西路。



臺北的南京西路。



臺北市街路名制定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建築，就是如今的行政院。

迄今的路名，已超過一甲子的大陸地理空間街路名空間觀，無疑地是一種「規劃者中心」，且缺乏未來城市發展考量的歷史印記。

謂的東西南北路名切劃，都要有可以劃分的軸線，以如今已經成形多年的臺北市街路來看，X X北路與X X南路是以忠孝西路接八德路為軸線南北切分，而X X東路與X X西路則以中山南北路及羅斯福路為東西切分。為何這個路名的東西南北切分，會以這樣的軸線來加以制定？其實，不管是東西或者南北的空間認知，分開看只能理解其各自軸線，但兩者之軸線的交點，便是觀者所處之地的中心點。這個路名的中心點不難想像，正是如今行政院所在，中山南北路與忠孝東西路的交會點。

目前的行政院建築，正是存在短短不到二年(1945年9月～1947年5月)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最主要辦公廳舍。以鄭定邦於1946年中任職該署民政處，而後又於1947年1月公告新路名與東西南北路區劃來看，臺北市當時的這個街路命名，正是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地理位置為中心所加以劃分。但若以如今整個市區已經向東發展後的情況來看，以東和西為名的街路，明顯地X X西路的區域要遠小於X X東路，亦即若以兩者路名的範圍來看，便是有種大東區而小西區的情形。這個狀況，乃因鄭定邦在規劃路名時，並未將日本統治時代所制定的都市計畫當成未來規劃的考量，只以當時眼前臺北的市街發展範圍，亦即最東緣大約只到如今建國南北路的情形做為街路名稱劃分的結果。因此，這套使用

百年來臺北的空間認知方位轉向

經過上述這樣的不同時代分析，可以知道清代的臺北盆地是屬於農業社會，農田灌溉的水圳系統深刻地影響了先民的空間認知；在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和臺北城內)時期，發展出了數種不同的空間觀點，例如與淡水河沿岸平行的河港型市街模式(由西向東)、從官署座向(由東向西)產生的空間認知，以及受到風水與坐北朝南中國傳統統治觀點影響的空間觀。但到了日本時代，統治者引入了科學治理與現代的都市規劃技術，將過去地名與街名中的傳統空間認知觀點逐漸抹去。

二戰後，國民政府在不考慮都市未來發展的情況下，以中國大陸地名系統替臺北市的街路取名，引進的「大中國規劃者中心觀」，除再次抹去了臺北殘存的歷史空間認知外，並因市區內東、西路所佔比例的分配不均，造成現代臺北市空間認知出現東西區極度不對稱的特殊現象。如今，儘管這些中國城市名稱的路名，以及「大東區小西區」的東西路劃分，都有著時代不宜且「政治不正確」的格格不入，但因為這些路名與區分方式，也已經用了好幾十年，恐怕早就難以更改。因此，它們或許就將如此繼續鑲嵌於臺北的城市街道裡，成為一種城市歷史的遺跡了。

